

两缺口理论与中国引资政策研究

康皓卿

(中山大学 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以两缺口理论为基础的中国的引资政策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随着经济实践的发展, 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殊现象: 巨额的国内储蓄、外汇储备与规模庞大且逐年扩大的外资流入并存。随即有声音以“两缺口不复存在”质疑中国的引资策略, 提出内资不缺, 外资大量涌入的“中国式悖论”, 引发了学界众多的思考。在此,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解读该“中国式悖论”: 双盈余背后的两缺口; 两缺口之外的多缺口; 放大的供给和需求, 并试图通过解读的过程更好地理解真实经济体的内在关系, 更有效地理解和把握目前形势下中国引资政策的走向。

关键词: 两缺口 双盈余 多缺口 返程投资 竞次引资

中图分类号: F8 **文献标识码:** A

引言

据央行公布数据, 2008 年 1 月, 我国货币供给量(M2)达 417846.17 亿人民币, 其中外汇占款 134917.96 亿人民币, 占比 32.3%; 从增量来看(与上月相比), 外汇占款的增量贡献了 45.3%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量。结合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来看, 通胀无疑成为 2007 年下半年至今以及今后一段时间内的头号关键词, 究其原因, 众说纷纭, “货币扩张”再次避无可避地被推向前台, 承受拷问。作为基础性货币增长的重要因素, 外汇占款一词也日渐敏感: 即使不能说巨额的外汇占款是造成通胀的根源之一, 但作为“45.3%的货币供给量的增量”的来源, 外汇占款在“推动通胀”这一点上显然难辞其咎。进一步分析, 我们看到 2008 年 1 月的顺差并未超过 200 亿美元, 也即经常项目项下创造了不超过 1500 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 可以推断绝大部分的外汇占款源自资本项目, 源自外资流入。再考虑到外资大量涌入的一些其他负面影响, 如对内资的挤出、对环境的破坏、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潜在威胁等因素, 我们有理由推想接下来国家将比以往更关注对过量流入的外资的调控, 本轮通胀或许正在成为引发国家对过量流入的外资的新一轮调控(哪怕仅仅是微调)的一大契机。由此也引发了笔者对于围绕引资政策展开的一系列理论探讨的关注和再思考。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 资金短缺十分严重, 两缺口理论成为中国 80 年代大量吸引外资, 实现经济腾飞的理论基础。然而进入 90 年代以来, 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殊现象: 巨额的国内储蓄、外汇储备与规模庞大且逐年扩大的外资流入并存。显然, 目前中国“非缺口型”的外资不符合“双缺口”模式的理论要求, 这一问题也成为具中国特色的金融谜团之一。亦有人质疑: 一方面国内储蓄过剩、外汇储备充足, 另一方面外资还在源源不断的大肆涌入, 如此岂不是对国内资源的闲置浪费? 两缺口理论是否已不再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以此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引资策略是否需要一次的彻底的改弦更张?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相信无论是就学理还是政策实践而言, 都将是一次有趣而有意义的尝试。

一、相关文献综述

当今世界, 吸引外资成为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竞相采用的途径, 其理论依据可归溯至 20 世纪 60 年代正式提出的双缺口模型: 发展中国家国内存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 吸引外资可以弥补国内资金的不足。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 资金短缺十分严重, 两缺口理论

成为中国 80 年代大量吸引外资，实现经济腾飞的理论基础。然而进入 90 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许多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特殊现象：巨额的国内储蓄、外汇储备与规模庞大且逐年扩大的外资流入并存。显然，目前中国“非缺口型”的外资不符合“双缺口”模式的理论要求，这一问题也成为具中国特色的金融谜团之一。亦有人质疑：一方面国内储蓄过剩、外汇储备充足，另一方面外资还在源源不断的大肆涌入，如此岂不是对国内资源的闲置浪费？两缺口理论是否已不再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此，我们先对国内外相关理论及探讨进行简单的回顾和梳理。

1966 年，属于美国后期重要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H • Chenery)和斯特劳特(A • Strout)在《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两缺口理论”。该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发展中国家因国内资源短缺而利用外国资源的问题，钱纳里和斯特劳特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必须累计足够资本，使资本形成达到经济发展目标所要求的水平^[2]。

该模型的理论基础是国民收入总需求和总供给恒等条件。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理论，可知：

$$Y=C+I+G+X-M \quad (2-1)$$

$$Y=C+S+T \quad (2-2)$$

其中，Y 表示国民收入；C 表示消费；I 表示国内投资；G 表示政府支出；X 表示出口；M 表示进口；S 表示国民储蓄；T 表示税收。

假设 $G=T$ ，令(2-1)式等于(2-2)式，得：

$$M-X=I-S \quad (2-3)$$

该等式意味着一个开放经济体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也即实现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的平衡。两缺口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大都存在着两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储蓄缺口指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从而形成投资约束，影响经济的发展；外汇缺口是由于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的进口，形成外汇约束，阻碍国内生产和出口。而引进外资可以使一国在不增加国内储蓄的情况下，借助于外国储蓄的流入来增加投资，借以摆脱投资水平受制于较低的国内储蓄水平的被动局面。因而该理论主要被用来解决发展中国家因国内资源短缺而利用外国资源的问题。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都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要依次受到熟练技能、储蓄和外汇三个主要限制性因素的约束、这三个因素把一国经济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连续的阶段，即技能限制阶段、储蓄限制阶段和贸易(外汇)限制阶段。在前面两个阶段上存在着投资-储蓄缺口(Savings shortage)，即所谓的“投资的有限增长”；在第三阶段，则存在着进出口(外汇)缺口(Foreign exchange shortage)，也即所谓的“贸易的有限增长”。他们指出，这三大制约因素和两个缺口的存在，使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要素得不到充分利用，阻碍经济发展，而吸收外援，引进外资，可以填补这两大缺口，解除这些限制性约束，加速经济发展。

需要注意的是，该等式表现为一种事后的结果，两缺口的相等往往在调节后才能达到。在调节前，投资、储蓄、进口和出口都是独立变动的。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额不一定正好与进口多于出口的数额相等。因此，政府部门有必要进行调节以达到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的相等。再次回到等式：

$$M-X=I-S \quad (2-3)$$

上式左端($M-X$)是进口与出口之差，也就是“外汇缺口”，是指进口支出超过了出口收入的数量。右端($I-S$)是投资与储蓄之差，也就是“储蓄缺口”，是指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

投资超过了储蓄的数量。从均衡的观点看，左右两式必须相等。如果出现失衡，(1) $M-X < I-S$ ，内部调节可以通过削减投资和增加储蓄，或者是增加进口和减少出口等措施来达到平衡等式的目的。(2) $M-X > I-S$ ，内部调节可以通过增加投资和减少储蓄，或者是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等措施来达到平衡等式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外部调节方式，就是通过引进外资来实现由失衡到均衡的转化。引进外资既可以减少外汇不足的压力，又节约了国内储蓄，减少了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一方面，可以用其生产的产品增加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另一方面，出口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可以提高民间储蓄，增加政府收入，提高整个国家的总储蓄水平。成功引进外资的经济效果，就是“两缺口”模型的理论意义所在。

“两缺口”模型认为，在一定的时期内任何发展中国家的两缺口中只有一个处于支配地位。如果储蓄缺口居于支配地位，就表明该国处于充分就业的状态，而没有充分利用其外汇收入。它虽有足够的外汇可从国外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但却没有充足的劳动力或其他资源去实现追加的投资项目。这说明该国存在生产资源短缺，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储蓄缺口。典型例子是 70 年代的中东产油国家。但是，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受外汇缺口约束的国家。他们拥有过剩的生产资源，尤其是劳动力过剩，所有可动用的外汇都用于进口。如果这类国家从国外获取资金以进口必需的生产资料，并取得相应的技术援助，那么来自国外的资源就能使其追加新的投资项目。在这种情况下，外援或外资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外汇短缺，提高收入增长率确能起重要作用。当然，发展中国家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的平衡，主要还应依靠国内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结构调整。

“两缺口”经济模型揭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必要性。如果外援和外资能够发挥两缺口模型所包含的改革作用，即将外部资源用于生产出口品的项目，或用于降低出口成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出口，或者使外援通过各种途径，促使经济发展，增加收入，导致储蓄增加。否则，两缺口会继续存在，外汇和资金将长期依赖外援和外资，还本付息的偿债问题将会使一国长期处于国际收支不平衡的压力之下，甚至导致债务危机。基于以上原因，两缺口模型在 60 年代曾被许多发展中国家当作制定外资政策的理论依据，然而，其局限性也随着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实践的发展而日益明显：

其一，“两缺口”分析的最基本假设条件是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相互间缺少可替代性，决定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各个变数相互独立地运动。这种假设显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只是便于分析而已。事实上，如果不单纯就缺口本身来进行调节，而是从缺口外开辟财源，一笔外资有时可以同时两个缺口发生作用。例如，利用外资引进机器设备，一方面是进口，而这项进口又无需用出口换来的外汇来支付；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投资，而这项投资也不需动用国内储蓄，因此可以同时减轻出口和储蓄两方面的压力。两缺口模型假设储蓄与外汇不存在相互替代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例如其忽视了多余的外汇可以用于购买生产资料，具有储蓄缺口的国家可以不需要外援或外资（以中东产油国为例）。其二，它也忽视了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之间的缺口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影响。其三，两缺口模型没有进一步深入分析两个缺口各自形成的原因。笔者认为，找出发展中国家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形成的原因，是消除缺口、突破约束的前提和基础。两缺口模型反复强调要利用外援、外资来消除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却没有详细具体分析两个缺口各自产生的原因，从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两缺口的问题。

继两缺口理论提出之后，西方一些学者又对缺口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主要有赫尔希曼三缺口理论：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匮乏固然重要，但并不是最关键的约束，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发展中国家技术的缺乏，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的技术知识、管理和企业家才能，因此他认为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之外还存在技术缺口。

针对中国出现的“双盈余”下外资依然大量涌入的奇特现象，国内的学者亦尝试作出自己的解读。卢汉林(1998,2000)^{[14][15]}较早地将双缺口理论引入到我国外资分析中，他认为

中国错误的引资观念、外资的多头审批体制、地方政府的无序竞争和储蓄转化为投资的障碍等因素导致了非缺口外资的产生。宋惠勤(2002)^[13]则分别从内外部原因对非缺口外资的成因进行剖析,一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在综合比较了要素资源禀赋、资本生产效率和母国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基础上决定向中国大规模地直接投资;另一方面,用一系列数据佐证了外资比内资更有效率,而且认为由于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而导致内资的出口转内销是非缺口外资产生的主要原因。Yasheng Huang(2001)^[11]提出由于中国政府重国企轻私企的公司政治优序原则(political pecking order offirms),私营企业的融资、进出口约束客观存在,FDI的进入能有效地解决私营企业的流动性约束;同时,由于外商投资企业享有的“超国民待遇”可能使其利用手中的特权设租,获取超额垄断利润,外资的大量涌入自然不足为怪。亦有学者明确提出中国非缺口外资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制度根源,采用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分别从产权、交易费用等方面对我国目前出现的非缺口外资的形成原因进行了阐释(刘泉 何昌福,2004)^[12]。

针对现时中国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即“两缺口”不复存在的形势下,“大力引进外资是否依然必要?”的疑问,一方面,国内研究者引入和发展了一系列多缺口模型,强调了在内、外资的两缺口之外,技术缺口效率缺口、就业缺口等的存在同样是引进外资必要性的重要依据(汤福仙 韩福荣,2000)^[11];另一方面,有研究指出,高储蓄并不表明不存在储蓄缺口,由于目前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是低效的,因此实质上依然存在巨大的隐性储蓄缺口(王芳 赵延涛,2005)^[9]。

关于两缺口理论的中国式悖论的争论与探讨仍在继续,倘若现阶段下,两缺口理论在中国已无适用基础,以此为理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国引资策略是否需要一次的彻底的改弦更张?倘若不是全无基础,那到底是哪些基本面发生变化,哪些基本面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以此为事实基础制定的中国引资政策又该如何调整或取舍?

二、中国引资实践的成就与问题

(一)、引资成就

尽管两缺口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不可否认的,它为发展中国家提高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或者说捷径,二战后,它迅速成为多数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国资本流入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中国的外资引入也是基于两缺口模型这一理论基础的。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与原苏联、波兰共同投资创办了首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由此揭开了新中国利用外资的序幕。由于历史调节的制约,当时利用外资的规模十分有限。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直至1978年,中国利用外资的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利用外资进入新时代,尤其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得以迅速发展壮大。我国利用外资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对外借款、外商直接投资和外商其他投资。1979-2005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达到8091.5亿美元,其中对外借款1471.57亿美元,占18.19%,外商直接投资6224.29亿美元,占76.92%,外商其他投资395.64亿美元,占4.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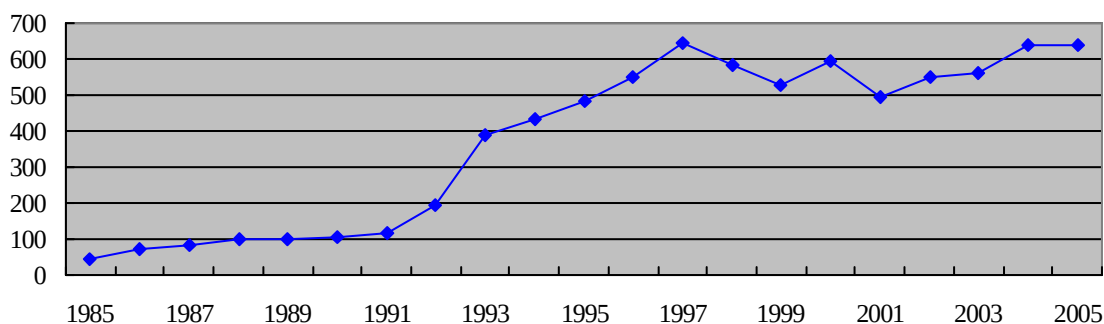


图1：我国历年实际利用外资（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截至 2006 年底，我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594445 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 7039.74 亿美元。在累积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中，农林牧渔业占不到 3%，制造业占 71%，服务业占约 26%；东、中、西部地区分别占 86.85%、8.79%、4.37%。世界 500 强跨国公司中已有 480 多家已来华投资或设立机构，跨国公司以各种形式设立的研发中心超过 980 家。¹

按照联合国贸发会议 2007 年 2 月公布的数字，2006 年我国吸收外资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居全球第四位（美国吸引外资 1773 亿美元，跃居全球首位；英国吸收外资 1698 亿美元，居全球第二；法国吸收外资 884 亿美元，居全球第三）。

引资成就不仅体现于数量规模上，亦体现在结构性变动上。近年来，外商投资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所占比重持续上升。2007 年，非金融服务贸易领域(按 WTO 部门分类)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势强劲，增幅为 57.14%，占全国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 41%，比 2006 年上升 11 个百分点。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下降 4.6%，占同期全国非金融领域实际使用外资的 55%，所占比重下降 3 个百分点。²

自国家、行业层面而下，落实于企业层面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运营呈良好发展态势。2007 年，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12216.57 亿元，同比增长 23%，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 10.4%；外商投资企业工业产值（现价）达 125036.94 亿元，同比增长 24.4%，占全国工业产值（现价）的 30.9%。全年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12549.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08%，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 57.73%；其中外商投资企业出口 6955.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3.36%，占全国出口的 57.1%。³

（二）、引资的区域不平衡问题

我国地区间经济基础、文化背景、资源禀赋差异很大，区域经济发展非均衡问题由来已久。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明显拉大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的，今日的东西差距也主要是由改革开放前的南北差异逐步转变而来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了非均衡的区域开放模式，依照中央政策，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形成了从南到北、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全方位、多层次、有重点的对外开放格局，中央政府将最优惠的对外开放政策给了东部沿海地区，将发展重点进行了战略性转移，从而使东西部在对外开放的时间、程度、享受的优惠政策上形成了较大落差，由此也决定了各区域对外开放度的差异性——“东高西低”，FDI 的空间分布亦呈明显的“东高西低”格局。

外资在我国区域间分布不均的主要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1.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东中、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我国固有的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再加上东、中、西部存在资源禀赋(尤其是人力资源禀赋)、地理位置等方面的较大区别，决定了我国东、中、西部的区位优势不同。东部沿海地区交通发达，有利于进出口，关联产业发达，便于提供中间产品和服务，人均收入较高，市场需求较大，再加靠近日本，“四小龙”及东盟等国家和地区，因此，沿海可以充分利用国外资源与国外市场，形成与东亚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以及欧美等国的垂直分工或水平分工，发展外向型经济。中西部地区处于内陆，区域内交通不便。人均收入与市场需求都落后于东部，技术水平也与东部有较大差距，因此西部只能与东部形成垂直分工，为东部提供协作服务。

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首先对东部地区实行了倾斜的优惠政策，使东部地区依托优越的经济基础、地理位置及丰富的人力资源，大量利用外资，加快了经济发展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原因之一。

3. 大部分中西部的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上有所失误，即一味地模仿东部的产业结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由于缺乏与东部一致的环境，致使与东部雷同的产业结构缺乏竞争力，造成了中西部资源的巨大浪费，进一步拉大了东西差距。

三、两缺口理论的“中国式悖论”

(一)、“中国式悖论”表现：双盈余

一言以蔽之，两缺口的“中国式悖论”指的是双盈余(历年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为负)。

两缺口模型认为，一国的国内投资需求可以从国内储蓄和国外储蓄两个方面来满足，只有在国内储蓄满足不了投资需求时才需要吸引外资流入。但是，在国内储蓄过剩的条件下，中国却仍然大规模吸引外资流入，这是双缺口模型所难以解释的。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其特点来看，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应该正处于通过外国资本的流入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这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内在动因。

然而，自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出现了很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怪现象，“双盈余”与外资的持续大量涌入并存的现象便是其中之一。由下表可知，除 1993 年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均超过国内投资总额，致使储蓄缺口为负值。对外贸易除 1993 年以外均为顺差，甚至 2005 年顺差突然扩大超过 8000 亿元；而 2005 年“存贷差”也已攀升到高达 8788.07 亿元。由此出现两缺口减少甚至消失并转化为盈余的现象，即出现了国内信贷收支大量存差和国际收支(包括对外贸易和资本往来)大量盈余的“双过剩”现象。在改革开放初期，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同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外资的引进经历了小规模缓慢增长，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在我国双缺口不存在的情况下，外资却经历了大规模的高速增长并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这似乎有悖于两缺口模型，按照两缺口模型的解释，我国的资金不是不足，而是过剩了。在储蓄、外汇双重过剩的情况下，为何还会出现外资大量涌入的“中国式悖论”呢？

表 1： 历年我国储蓄和外汇缺口（亿元）

年份	储蓄缺口	外汇缺口	年份	储蓄缺口	外汇缺口
1988	151.1	288	1997	-2857.8	-3354.2
1989	185.5	243.8	1998	-3051.5	-3597.5
1990	-510.3	-411	1999	-2248.8	-2423.4
1991	-617.5	-428	2000	-2240.2	-1995.6
1992	-275.6	-233	2001	-2204.61	-1865.2
1993	679.4	701.4	2002	-2794.2	-2517.6

1994	-634.1	-461.7	2003	-2152	-2097.5
1995	-998.5	-1403.7	2004	-4080	-2667.5
1996	-1459.3	-1019	2005	-8788.07	-8374.4

注：表中数据均根据中经专网数据计算得出

（二）、隐性缺口

1. 隐性的外汇缺口

自 1993 年最后一次经常项目逆差以来，中国一直是经常项目顺差，即便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不例外。1994—2005 年累计经常项目盈余 4088.77 亿美元，这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大不相同。那么，中国的经常项目与外汇顺差果真如数字所反映的那么乐观吗？

换一个角度解析中国的外贸数据，我们将发现中国并没有违背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一般规律。我国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中 50%以上为加工贸易产品，加工贸易是“两头在外”的贸易方式，主要是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国内加工组装再出口，因此，这可以看作是不跨境的劳务输出方式，中国主要在其中赚取加工费。在国际收支统计中，可反映为经常账户收益项下的职工报酬。如果将加工贸易方式的进出口差额从总贸易差额中扣除，则 1994—2005 年间，除 1995、1997、1998 和 2005 年外，其他 8 个年份均为逆差。累计逆差达 1584.33 亿美元，而非海关公布的累计顺差 4088.77 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并未违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外汇盈余的背后依旧存在着实质上的外汇缺口。

2. 隐性的储蓄缺口

针对当前中国企业发展是否依旧受到“储蓄缺口”的制约这一问题，众多学者有过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 Yasheng Huang(2001)提出的 FDI 对于私营企业的流动性缺口的弥补理论。他认为由于中国政府重国企轻私企的公司政治优序原则(political pecking order offirms)，私营企业的融资、进出口约束客观存在，FDI 的进入能有效地解决私营企业的流动性约束。也有学者经过研究指出，高储蓄并不表明不存在储蓄缺口，由于目前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机制是低效的，因此实质上依然存在巨大的隐性储蓄缺口（王芳 赵延涛，2005）^[9]。

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要经过储蓄、融资和投资三个阶段，储蓄要经过一定的渠道和机制才能转化为投资。储蓄的短缺、融资渠道的阻塞和投资能力的缺乏都会造成资本形成的困难。“两缺口理论”中假设国内储蓄能够完全转化为投资。这一假设在一国金融体系效率很高并且无国内储蓄外流的情况下完全可能成立，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一假设与现实不符。

从储蓄上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保持较高的储蓄率，特别是自 1994 年以来，储蓄率一直高于投资率。但从我国引进外资的实践可以看出，我国缺乏的不是资金，而是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有效途径。我国国内储蓄虽多，但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储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储蓄大幅度上升，成为国民储蓄的主体。据统计，1978 年，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仅为 15%，到 1988 年则上升到 62%，最近几年比重在 50%波动。⁴而我国居民储蓄主要采取银行存款的形式，因而企业对外部融资的依赖变成了对银行贷款的依赖，在我国金融分业经营体制下，这意味着我国的主要金融形式是间接金融，而非直接金融。

直接融资是通过直接证券的创造来沟通投资联系的，能否提供高质量的直接证券对于实现储蓄向投资转化至关重要。在我国，大多数上市公司是受“圈钱动机的驱使，上市公司给

投资者的回报率很低。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是由国有企业转制而来的，国有企业的低效率使其难以提供真正有投资价值的股票资产。在投资回报率普遍偏低的情况下，股市对投资者仅具有投机的价值，没有多大投资的价值。股市成为“圈钱”的场所，“投机”行为使其失去沟通储蓄投资渠道的应有功能。

而我国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主体的银行体系由于自身的缺陷却也难以承担间接金融的重任：因为，我国四大银行还不是真正的商业银行，其治理结构带有明显的行政性治理结构的特点，出现问题可以得到行政性支持或从行政性安排中寻找出路。行政性治理结构及经济约束的缺乏，使国有银行贷款的发放偏离其经济标准，加之与国有企业在产权结构上的同一性，使其贷款偏好于效益并不高的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得不到应有的金融支持，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结构上的不对称性。这样不仅不能化解历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且不断造成不良资产的积累。国有银行大量的不良资产无疑使得储蓄投资通道更加阻塞。种种因素造成了一方面我国银行存在巨额的存贷差，另一方面众多私营企业却困于贷不到款、融不到资的境地。

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而转化为投资的那部分储蓄总量才是“两缺口理论”中的 S 。由此可见，国内储蓄盈余的出现并不必然意味着“投资-储蓄”缺口的消失，中国低效的金融资源利用体系使得大量资金被闲置，无力充当能转化为资本的“有效储蓄”，造成了事实上的“储蓄缺口”。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虽然我国两缺口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但还存在着实际上的缺口。外汇虽多，但很大一部分是在为他人做嫁衣；储蓄虽多，但有效转化为投资却需要大打折扣。所以，仅根据账面上的数字简单地算出“进口-出口”、“投资-储蓄”而论断中国已不存在两缺口是罔顾中国具体国情的。事实证明，“两缺口”理论在中国依旧有其适用的基础，“中国式悖论”其实“不悖”。

（三）、多缺口

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的经济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资本。在大工业时代，土地、资本、人力是主要资源，发展中国家尤其渴望资本需求，加上国内产品竞争力不强，出口创汇能力低，因此出现“两缺口”。现在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又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信息、人才已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资源。众多学者亦对缺口该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赫尔希曼三缺口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管理、企业家的缺乏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资本吸收因此而受到限制，因此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之外还存在技术缺口；M.P. Tadaró 等提出的“四缺口”理论，在原有两缺口的基础上增加了政府税收缺口和生产要素缺口(即技术、管理、营销技能等)，并指出外资在弥补后两个缺口方面具有特殊的作用。针对现时中国的“高储蓄率、高外汇储备”即“两缺口”不复存在的形势下，“大力引进外资是否依然必要？”的疑问，国内研究者引入和发展了一系列多缺口模型，强调了在内、外资的两缺口之外，技术缺口、就业缺口、效率缺口等的存在同样是引进外资必要性的重要依据（汤福仙 韩福荣，2000）^[11]。

1. 技术缺口

外资的引入，因为伴随着技术外溢效应而具有了另一重意义。发展中国家技术缺口的存在和外资对技术缺口的弥补作用使得引资获得了另一个必要性依据。外资通过在华投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对提高国内整体技术水平发挥着正外部性，而跨国公司成为外资得以发挥该作用的重要载体：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跨国公司为了使自己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上更有竞争力，相比 80 年代开始较多地引进先进技术。跨国公司在我国使用的技术不仅普遍高于中国国内同类企业，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的技术就是其母公司的先进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的技术空白。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主要途径有技术

扩散效应、技术竞争效应和技术应用效应。

技术扩散效应是指跨国公司所具有的技术能力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外部扩散，主要方式包括：人才流动、当地配套、技术交流、技术合作和技术示范。

技术竞争效应指当面临跨国公司投资企业的竞争是，原先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甚至垄断地位的企业为了保持市场竞争力，会加快技术开发的速度和提升技术水平。实践证明，跨国公司竞争带来的压力，是我国通讯设备、汽车、工程机械等许多行业中的内资企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的重要推动力。

技术应用效应是指由于外资企业进入相关的配套行业，生产出了高质量、低成本的零部件和原材料，使国内已经具有的最终产品设计、集成、组装技术具备了在更高水平和档次上应用的可能性。

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技术硬约束是长期的，其开发研制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承担很大的风险，因此技术差距在短时期内依靠自己的力量是难以弥补的，落后国家往往都是选择引进国外的现成技术来加速自己的经济发展。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对引进的技术加以消化吸收，并能够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则这种引进就会促成发展中国家的实质性发展。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如果对外资利用不利，则可能造成对外资的过度依赖，阻碍国内研发新技术的动力以及将其研究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造成越引进越落后、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被动局面。

2. 就业缺口

由于我国二元化的劳动力结构，吸引外资可以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有效地创造就业机会，弥补就业缺口。

目前，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一方面随着农村改革的不断深入，原来承担主要就业渠道的第一产业劳动力绝对数呈下降趋势，大量农民脱离土地涌进城市，使城市待业大军日益壮大；另一方面，由于中西部地区的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不仅没有使第二产业吸纳的新增劳动力抵偿第一产业劳动力的减少数，而且第二产业自身还不断产生下岗职工，从而使“就业缺口”不断扩大。从现实来看，单靠中西部地区自身的力量将难以填补“就业缺口”，而利用外资则是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途径。通过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发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低的优势，选择节省资本、多用劳动力的工业技术路线，弥补“就业缺口”。由于统计数据的有限，下表仅显示了在工业企业中，外资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就业的拉动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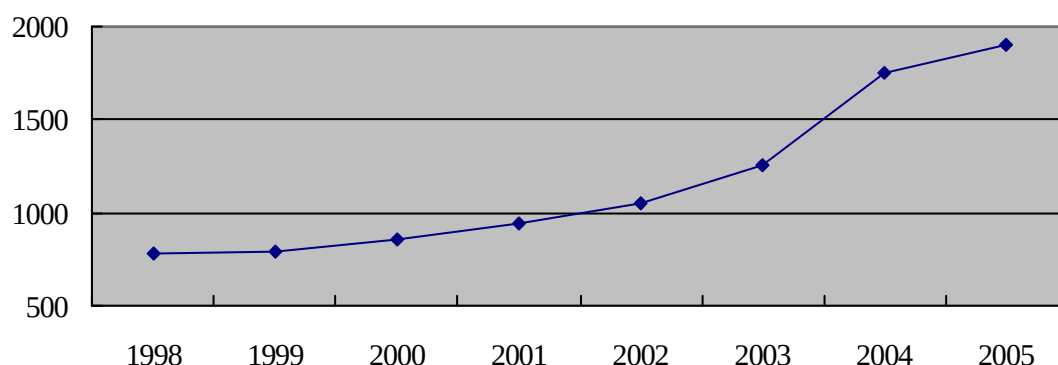


图2：三资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万人）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通过考察 FDI 对于我国就业的正向作用，亦可证明外资对于就业缺口的弥补作用。以下选取 1985 至 2005 年中国的总就业人口 (TL) 作为因变量，劳动生产率 (LR)、实际利用外资(FDI)、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滞后值(GDP(-1))作为自变量，取对数处理后，回归结果如下：

$$\text{LnTL} = 0.05\text{LnFDI} - 0.01\text{LnLR} + 0.11\text{LnGDP} + 8.32 \text{LnGDP}(-1) + 8.51 \quad (3-1)$$

(8.82) (12.23) (4.02) (2.14)

$$R^2=0.93, F=120.87$$

模型总体通过了显著性的统计检验，自变量 LnFDI 前的系数亦通过显著性检验，且为正值，表明外资对于解决我国的就业问题确实作出了贡献。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数化处理，系数具有了弹性系数的含义，虽然自变量 LnFDI 前的系数数值偏小，但由于我国就业人口基数巨大，外商投资对就业还是有很大拉动作用的。

3. 效率缺口

引进外资的意义仅仅是弥补了内资在量上的不足吗？我们的储蓄转化为投资后，究竟能不能像外资一样表现为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表现为严格的管理和实际运行的高效率呢？如果不能，内、外资的效率缺口的存在便成为继续引进外资的必要性依据，而不论传统的“两缺口”存在与否。

为了验证内、外资企业是否存在效率上的区别，我们将设定一个经验性的回归模型，在该模型中，效率指标（如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某些我们认为会影响企业生产效率的可量化的因素将作为自变量，而是否为外资企业将作为一个虚拟变量被引入。总体的检验思路就是：以内、外资企业不存在效率上的区别作为原假设，即以虚拟变量前的系数为 0 作为原假设，进行回归结果分析，（1）倘若该虚拟变量前的系数可以通过显著性检验，也就是说“作为外资企业”对效率产生了确切的影响，则原假设被推翻，即内、外资企业确实存在效率上的区别；反之，系数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的话，我们就不能拒绝该变量对效率无影响的原假设，即我们并不能认为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效率上存在区别。（2）在虚拟变量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下，系数为正则说明外资企业拥有比内资企业更高的效率，系数为负则说明内资企业有更高的效率。

以下，我们选取 1999 年至 2005 年全国工业企业中内、外资企业各自的全员劳动生产率 (OLP) 作为因变量，固定资产 (FA) 和企业身份 (FE) 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其中 FE 根据是否为外资企业分别赋值 1 和 0：

$$\text{OLP}=0.07\text{FA}+ 367.24\text{FE} +108.13 \quad (3-2)$$

(26.25) (35.14) (18.45)

$$R^2=0.35, F=88.19$$

回归结果分析：（1）并不太高的拟合优度 (R^2) 可以由缺失一些重要自变量得到解释，比如技术方面的资金投入本应是影响效率的重要因素，不过此处因为数据的难以获得而未能作为自变量被引入，造成方程总体的解释力下降，但基于企业身份的赋值是独立于此类缺失变量这一事实，可以说在方程总体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情况下，较低的拟合优度并不妨碍我们对该虚拟变量显著性的检验。（2）虚拟变量前系数显然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内、外资企业确实存在效率上的差别，即“效率缺口”。（3）虚拟变量前系数为正，说明外资企业的效率高于内资企业，自然得到推论：引进外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效率缺口”。

此外，考察内、外资的效率差别，亦可以通过多项指标的直观比较。在此，我们采用如下指标：产出资本比、利润资本比、资本贡献率。我们选用内资工业企业与三资工业企业进

行资金效率相关指标的比较。下表列举了 2005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若干经济总量指标：

表 2：2005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若干经济总量指标（亿元）

	工业总产值	工业增加值	固定资产净值 年平均余额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	利润总额	本年应交 增 值 税
三资	79860.23	20468.28	21419.03	326.9	4140.81	1811.52
内资	171759.27	51718.71	68041.46	2670.44	10661.73	6709.4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

（1）产出资本比：资本和产出分别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工业总产值或工业增加值衡量，因此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

产出资本比①=工业总产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产出资本比②=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2）利润资本比=利润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3）资本贡献率=（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本年应交增值税+利润总额）/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表 3：内、外资效率若干指标比较（%）

	产出资本比①	产出资本比②	利润资本比	资本贡献率
三资	372.84709	95.56119	19.33239	29.31613
内资	252.43325	76.01058	15.66946	29.45497

注：数据由表 2 数据计算得出

从资本产出比上来看，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得出的结论都是三资企业该指标优于内资企业。该指标比较直接地衡量了生产效率的差别，就增加值而言，外资比内资的产出资本比高了近 20 个百分点。

从利润资本比上来看，外资（19.3%）同样表现了比内资（15.7%）更高的效率，该指标衡量了资本的获利水平，是资本效率的重要表现之一。

从资本贡献率上来看，外资（29.3%）略低与内资（29.5%），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资本贡献率衡量了资本的全部贡献，包括对企业本身的贡献（利润）和对社会的贡献（税收）。外资在利润资本率明显高于内资的情况下，表现出了略低与内地的资本贡献率，无疑也暗含了其显著低于内资的社会贡献率，这与其一直以来享受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分不开的。而这，也成为大量外资持续涌入甚至内资变身“外资”回流的一大诱因。接下来我们也将就此展开一段探讨：

（四）、外资供需分析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 20 多年中，中国已经吸收的 FDI 达到 5000 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 50 年间日本吸收 FDI 的 10 倍。与此同时，中国自 2002 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 FDI 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 FDI 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绝大多数人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为何涌入中国的外资规模如此庞大？为何外资格外青睐中国呢？下文将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1. 放大的供给：返程投资问题

经济学上的“返程投资”问题也就是俗称的“假外资”：即国内企业携资本到国外注册一家公司，再通过这家公司返回国内投资，从而享受到包括税收在内的各种外资优惠政策。

一国对内外资的差别政策，往往会使资本外逃并形成独特回流。我国对外资采取了许多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措施。主要有：(1) 外商投资企业充分享有投资决策权、辞工权等自主经营权，而国有企业法定的 14 项权利却还有许多没落实；(2) 内资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而外资企业则没有这方面的问题；(3) 外商投资企业享有高度的税收优惠；(4) 外资企业在外汇使用上的优惠。如 1994 年以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持有现汇，对内资企业则实行外汇留成的额度管理；1994 年以后对内资企业实行结汇售汇制，不能持有外汇余额；而外商投资企业则可以保留现汇账户。

拿税收来说：1994 年我国税制改革就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统一，但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我国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优惠税率。我国的名义所得税税率是 33%，不过外资企业在沿海地区投资，可享受 24% 的优惠税率，如果投资地点是在深圳、上海浦东等经济特区，那税率还会进一步降至 15%，比在香港还低。如果再加上其他的税务优惠，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平均税负只有 11%。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率要高出一倍，达到 22%，国有大中型企业的税负率更高达 30%⁵。诸如此类的遍及税收、金融等领域的优惠措施使外资企业享受的待遇远高于内资企业，形成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必然导致国内资本外逃，然后再以“外资”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优惠待遇。

我国的资本外逃现象一度非常严重，每年都有大量资金流向国外，据不完全统计总额已达数百亿美元之巨；而每年以“外资”身份回流的数目亦相当可观⁶，成为我国引进外资中不可小觑的一部分。中国假外资之多由下述事实就可看得出来：以 2005 年为例，商务部外资司的统计数据表明，当年对华投资前 10 位的国家和地区，来自中国香港、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萨摩亚等离岸中心的投资大幅增加，实际投入外资超过 240 亿美元。截至当年 10 月底，80 多万家在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的企业中，大约近 20 万家与中国企业有关，其中包括国美、盛大。2006 年的两会“一号议案”中披露，通常估计我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账面统计数字中有 1/3 左右实际上是这种回流的“假外资”。

2. 放大的需求：地方政府的“竞次引资”问题

如何理解“竞次”一词？先我们从熟悉的竞争一词谈起：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社会成本的增加等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

结合中国的引资实践来看，不难发现：除了受中国广阔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成本的吸引之外，全球 FDI 蜂拥而至的原因还包括，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争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许多地方政府一味追求 GDP 为主的经济指标增长，致使区域间招商引资竞争变成了低水平的“让利竞赛”。

1990 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经济在原有体制框架下的自主高增长动力实际上已经衰竭，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的金融资源被全数上收，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外资便成为各地方政府继续维持本地经济增长几乎惟一可行的手段。除此之外，引进外资作为一种国家战略也受到了毫无节制的鼓励。无论对于地方政府还是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都是风险最小而收益最大的。这是中国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 FDI 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背景。然而，当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洞悉了这个秘密并且同时将其作为发展经济的不二法门的时候，竞争走向白热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在中国引资之风刮得最为炽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地方政府的甩卖式的竞争达到了非常惨烈的程度。

以苏州为例，苏州是中国吸引外资最为成功并将这个战略发挥到极至的榜样，为此，苏州获得了一系列的赞誉和政治上的奖赏。但苏州为此付出的代价却很少有人提及。一份江苏省政府的内部刊物披露，苏州的土地开发成本为每亩 20 万元，但为了引进外资，却将地价压至每亩 15 万元。在这种恶性竞争的驱使下，周边的吴江、宁波、杭州地区只好将地价压到每亩 5 万元左右的超低水准。由于地处相邻，号称寸土寸金的上海也加入了这种杀价竞争。在上海郊区，每亩土地的价格也被压至 5 万—6 万元。如此，就出现了在中国经济不断增长但招商用地价格不断下滑的奇怪现象。在苏州昆山，每亩工业用地的价格从 2001 年的 9.5 万元降到 2003 年的 8 万元，再降到 2003 年的 6 万元。对于这种降价，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一位负责人说：“我们不降就失去竞争力。”这位负责人显然是诚实的，但这种诚实却将中国 FDI 中的竞争逻辑暴露得相当彻底。

中国地方政府在 FDI 上的竞争虽然首先表现在土地的甩卖上，但决不仅仅表现在土地上。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争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予以补贴。在长江三角洲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1: 1 甚至 1: 2 的比例）、“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屡见不鲜的引资“组合拳”。尽管国家早有规定，外资企业可享受基本税 15% 及“两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但显然许多城市都以各种方式突破了这一政策底线。

了解了中国这种放血式引进 FDI 的真实内容，我们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2005 年，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 雄踞首位、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人均住房面积和私家车拥有量等）。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 26 年当中吸收的 FDI 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 50 年的 10 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极低（意味着储蓄缺口的庞大）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 FDI 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

现存体制下，对于地方政府官员个人来说，不惜一切引进外资是低风险而高收益的。地方政府及官员个人的“政绩主导”理念引致的引资行为必然导致为对外资的狂热追求，而与地方经济发展本身的外资需求严重脱节，甚至无限放大其真实外资需求。可以说是各个引资主体的利益目标不同，导致了引资行为的偏差。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国家与地方政府的引资利益目标各不相同。国家引进外资的目的是弥补国内资金不足，迅速提升我国的经济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引进外资逐渐看重质量。为此国家制定了一系列的外资优惠政策，但其中一些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以及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理解不力直接导致了各级引资主体

引资行为的偏差。各级地方政府同样也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引进外资工作中，追求行政利益高于追求市场效益，甚至把利用外资的市场竞争演化成了行政竞争，争相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资，罔顾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正如一位评论家所精确评论到的那样：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而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每年都有规模如此庞大的外资涌入中国自然不足为奇了。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初步总结如下：

返程投资的存在，使部分内资以外资身份出现，纳入 FDI 统计口径，在每一个价格水平上增加了 FDI 的供给，反映到供求分析中则表现为供给的扩张（即图 3-2 中供给曲线的右移）

地方政府的“竞次引资”，付出高昂的社会、经济成本，实质就是在远高于合理水平的价格上获得外资，放大经济发展对外资的内在需求，反映到供求分析中则是需求的扩张（即图 3-2 中需求曲线的右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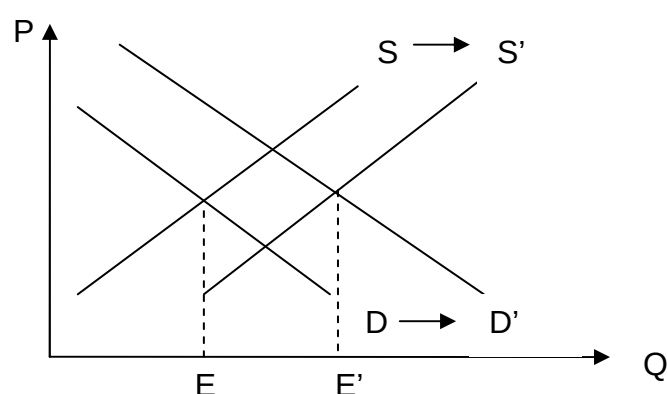


图 3：FDI 的供求分析

从图中不难看出，假定在理性的政府行为及不存在内资变身的投机行为下，中国的外资引进的最适度规模为 E ，然而在供给、需求双方对真实曲线的背离的共同作用下，FDI 的成交量（ E' ）必然高于原本的均衡成交量（ E ）。尽管我们很难确定最适度规模究竟是多少，因为取决于各类缺口（储蓄、投资、技术、就业、效率缺口等）的大小及外资弥补各类缺口的效果的量化问题，但此处基于供给、需求放大之后的分析而得出的“外资一定会存在过量引入”的结论在逻辑上是没有问题的。所谓“中国式悖论”：储蓄、外汇双盈余的情况下，外资却持续大量、甚至是过量地被引入这一现象，在此获得了动机上的支撑和体制的默许甚至是纵容。

四、 结语和政策启示

很多时候，在我们历经了对于一个悖论的解读过程之后，还是不能得出一个现象合理与否的结论，因为往往一个现象包罗了众多的合理因素与不合理因素，但毕竟解读的过程有助于我们发现隐藏于其中的各式问题，继而寻求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这，或许才是解读一个悖论的真正意义所在。

至此，回顾我们关于引资问题的两缺口理论的“中国式悖论”的三种解读，可以归纳为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如果两缺口已经不缺，中国继续积极引资是否必要？而目前大量外资涌入中国的局面又是如何造成的？前两种解读（“双盈余背后的两缺口”和“两缺口之外的多缺口”）回答了中国继续积极引资的必要性，第三种解读（“放大的供给和需求”）则从特定

的角度阐述了流入中国的外资何以如此规模庞大，在佐证了中国得以大量引资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暗含了原有体制下中国过量引资的必然性。

学术界关于利用外资的争论或讨论历来踊跃，而学术探讨的一个重要意义可落实为结论在政策层面上的影响，此次对两缺口理论“中国式悖论”的解读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政策启示呢？

由于实质上储蓄和外汇缺口的依旧存在，以及外资对技术、就业、效率缺口的弥补作用，整体上，我国是不会放弃积极引资的策略的。

外资并非多多益善，考虑到假外资及地方恶性引资竞争的存在，必然存在超出适度规模的过量外资，因此我国引资政策在杜绝假外资流入、调整引资结构方面尚有一定的发挥空间。

事实上，我们也已经看到涉及外商投资的各项政策调整正陆续出台或正在筹备中。2007年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实行“两税合一”，该税法参照国际通行做法，体现了“四个统一”：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用 25%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前文中的分析中提到，内、外资的税负不统一是催生“假外资”现象的重要原因，而两税合一的出台，势必弱化内资转外资的驱动力，将有效遏止“假外资”的流入。

取消传统税收优惠的同时，新税法也将给外商投资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如从事高新技术、基础设施、农林牧副、环境保护和安全生产等行业的企业将享受新的税收优惠。不难发现，中央政府正更成熟地考虑社会成本、社会收益问题，对外资的结构调整意图逐渐显现。

同时，有关部门也已经或正在考虑调整土地、加工贸易、外汇、出口退税等引资方面的政策措施，其叠加效应值得我们密切关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此类中央政府层面的政策的调整其实施效果最终有赖于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度，而地方政府的切实执行与否显然还是决定于其利益获得机制。倘若其政绩评价体系还是“GDP、财政收入主导型”，倘若体制设计不能将地方政府盲目引资导致的社会成本“内部化”于地方政府本身，其狂热引资的行为将不会从根本上得到遏制，既是饥不择食，外资结构的优化怕也无从谈起。引资政策的调整，如果没有配套政策的跟进和体制的革新，其效果终将打上折扣。

针对前文提及的中国引资实践存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我们应该在进行引资政策措施的统一规划的同时也要加强分类指导和综合协调。在中央政府层次上，既要基于地区差别对各地引资政策调整方向做出指导，也要按照平衡区域发展和促进国内资本流动的要求对各地引资政策进行统一规划和综合协调。在地方政策层次上，东部沿海地区在吸引外资上应着力提升流入外资的科技水平和产业层次，中西部地区既应促使流入规模增加，也要关注外资质量和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综合效应。

具体而言，各地在制订区域发展战略时，应根据各地区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吸收外资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东部地区：推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环渤海地区吸收加快发展、优化结构，力争再形成若干个外资密集、内外结合、带动力强的经济增长带。

中西部地区：积极引导外商参与我国西部大开发，鼓励东部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到中西部地区再投资，实现产业梯度转移。建议尽快明确外资参与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振兴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通过吸收外资加快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力争再造我国的重型装备工业基地。加快修订《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适当放宽部分行业准入条件，推动“万商西进”，鼓励中西部地区积极承接东部地区开放型产业和国外产业转移，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

在继续推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切实实行“西部大优惠”策略,即推出以土地优惠、所得税优惠为核心内容的更加优惠的西部引资政策。虽然我国吸收外资的政策已逐步向产业导向倾斜,但是在对外开放中落伍的西部地区,随着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势必加大对外资的需求,对这一地区优惠政策的倾斜仍是不可缺少的。

参考文献

- 【1】 Yasheng Huang. Selling China: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the Reform Era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2】 H •Chenery, A •Strout. 国外援助和经济发展[A],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
- 【3】 苗芳, 勾东宁. 两缺口理论与中国引入外资简析[J], 商业研究, 2003,24: 47-49
- 【4】 王丹丹. 中国外资经济区域分布状况[J], 财经界, 2007,07: 90-91
- 【5】 梁优彩. 中国的两缺口模型[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1989, 4: 16-22
- 【6】 杨晔. 内外资双溢出现象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03, 4: 24-28
- 【7】 舒欣, 陈 浩. 内外资双溢出背景下外资流入分析[J], 决策借鉴, 2001, 8: 47-51
- 【8】 吕海彬. 从“双缺口”到“双溢出” [J], 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6, 4: 13-17
- 【9】 王芳, 赵延涛. “两缺口”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及其扩展[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2005, 6: 7-10
- 【10】 何德旭, 饶明. 中国两缺口不缺情况下的外资引进: 1994-2004 ——一个金融视角下的微观解释[J], 经济学家, 2007,1: 25-31
- 【11】 汤文仙, 韩福荣. 三缺口模型: 对两缺口模型的修正——对中国利用外资行为的合理解释[J], 当代经济科学, 2000, 22: 36-40
- 【12】 刘泉, 何昌福. 非缺口外资之谜的制度经济学解释[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 7: 74-78
- 【13】 宋惠勤. 我国非缺口型外资的成因及几点思考[J], 中国对外贸易, 2002, 7: 10-11
- 【14】 卢汉林. 我国非缺口型外资的经济影响与对策[J], 投资研究, 2000, 2: 37-41
- 【15】 卢汉林. 引进外资的理论分析与实践比较[J], 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2: 29-35
- 【16】 徐强. 我国吸引外资政策的模式转换与格局调整[J], 经济研究参考, 2006, 23: 34-35
- 【17】 杨俊峰. 中国引资政策: 向左走? 向右走? [J], 管理与财富, 2006,01: 21-23
- 【18】 王英. FDI 与我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成因与对策[J], 经济研究导刊, 2007,12: 152-153
- 【19】 盛斌.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20】 侯本旗. 当代国际直接投资与中国的外资策略[M],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21】 唐勇. 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维度[M], 上海: 立信会计出版社, 1999

【22】 商务部课题组. 中国外商投资报告[R], 2007, <http://wzs.mofcom.gov.cn>, 2008,1,25

An Empirical Study on Two-Gap Theory and Chinese Policy on Attracting Foreign Investment

KANG Hao-qing

Abstract: China's policy of encouraging foreign investment which is based on the two-gap theory was once of great success in the world. However, after further development, there were many special as well as strange phenomena occurring in China's economy, such as huge domestic saving, great foreign exchange reserve, and surging foreign capital inflow. Doubts about the "great policy" arose, which argued that the "two-gap" was no longer existent and "Chinese paradox" happened due to abundant domestic fluid combining with large foreign capital inflow. Many scholars focused their concentrations on this puzzle in recent years.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tried to explain this "Chinese paradox" in three aspects: tow-surplus, multi-gap beyond the two-gap and swelled supply and demand. Last but not least, we hope that though this research, we can learn more about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our economy and understand the policy better .

Keywords: Two-gap Model Two-surplus Multi-gap Model return investment race to the bottom

收稿日期: 2008-11-02

作者简介: 康皓卿 (1985-), 女 (汉族), 江西永新人,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硕士

¹ 商务部官方网站:《中国外商投资报告-2007》<http://wzs.mofcom.gov.cn/>

² 同上

³ 由商务部数据整理得来 http://www.fdi.gov.cn/pub/FDI/wztj/wstztj/wstzjckx/t20080125_89207.htm

⁴ 由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数据整理得出

<http://www.pbc.gov.cn/diaochatongji/tongjishuju/gofile.asp?file=2007S03a.htm>

⁵ 来源: 重庆经济信息网 www.cq.cei.gov.cn

⁶ 舒欣, 陈浩: “内外资双溢出背景下外资流入分析”, 《决策借鉴》, 2001年第8期